

# 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演变

## ——基于1999年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

蔡旻君,古立春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文章以1999—202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政策为研究对象,从政策演进过程与政策主题及工具变革两大视角进行分析,以全面把握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演进脉络。总体而言,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政策先后经历了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期、改革创新期、核心素养期三个阶段,素质教育、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是贯穿各时期的核心主题。虽然各种基础教育评价的政策工具均衡发展,但激励工具明显不足。建议今后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突出“个性化”与“差异化”新内涵;切实落实“为教而评”的理念;构建多方协商与参与的评价机制;引导招考制度向科学育才与选才方向发展。

**关键词:** 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教育质量;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58.1,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80(2021)04-0073-07

# The Evolution of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ies in China

## —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Policy Texts since 1999

Cai Minjun, Gu Lichu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s on the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ies in China from 1999 to 2020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from two perspectives of policy evolution period as well as policy theme and tool typ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evaluation policies. In conclusion, China's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period of all-round educati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period and the core literacy period. All-round education, education equity and education quality are the core themes throughout each period. Although the various policy tools have experienced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incentive tools are obviously insufficien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the future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ies should highlight the new connotations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practical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assessment for teaching”,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multi-party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and guide the recruitment system to the direction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selection of talents.

**Keywords:** Elementary education; Evaluation policies; Quality of education; Textual analysis

\*基金项目:2020年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甘肃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20YB038)。

收稿日期:2021-02-22,修回日期:2021-04-29

##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这是新时代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破除教育评价功利化倾向与建立良好教育生态环境的行动指南,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自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开展第八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在基础教育评价领域做了大量探索,其中具有权威性、合法性及价值相关性特征的评价政策制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础教育评价政策不仅是我国政府关于教育全面决策部署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宏伟蓝图形成的基础。研究从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对政策文本的计量分析与主题内容分析,明晰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的特点,进一步厘清不同阶段的政策主题和政策工具发展趋势,并在总结教育评价改革经验的同时,结合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主题,探讨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应然性问题。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设计

利用中国知网可视化工具,对199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的基础教育政策进行文献检索,统计发现: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专家学者对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研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于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转而呈下降态势,随后趋于稳定;有关基础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国外的基础教育政策、义务教育公平以及基础教育改革;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基础教育政策的内容和特征、国内外基础教育政策对比及启示、基础教育政策演绎逻辑及价值观念等方面,专门将基础教育评价政策作为主题的研究较少。现有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发展脉络和演绎逻辑,评价政策的价值观念和现行评价政策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在评价政策的发展脉络和演绎逻辑上,冯虹认为,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经历了法制规范、改革创新、科学完善三个时期,全面依法治教、推进评价改革、

建设专业化评价队伍是我国教育评价政策发展的关键。<sup>[1]</sup>在评价政策的价值观念上,专家学者大多就基础教育公平、综合素质、核心素养三大价值观展开研究。褚宏启从政策工具和教育公平的视角进行探讨,认为要精准帮扶学困生,要创新评估学优生,要以教育政策工具为抓手改革评估考试制度与评价内容,落实教学质量评估与督导机制。<sup>[2]</sup>针对基础教育评价的突出问题,张向众认为我国教育评价政策改革要着力解决好内部的“选拔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外部的“教育改革—评价改革”这两对关系。<sup>[3]</sup>

纵观现有的对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研究可以发现:缺乏对政策文本本身的研究;教育评价政策研究不够系统、全面。孙锦涛认为:“专业化的教育政策分析,应该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标准,对政策文本本身进行内容、过程、价值、环境的全面系统分析。”<sup>[4]</sup>因此,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二十年来的基础教育评价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归纳和分析,力图以新的视角来审视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政策,从中汲取智慧经验,为《总体方案》的贯彻落实提供参考。本研究具体设计如下。

### 1. 研究对象

研究以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指党和政府为发展和改革教育对基础教育所涉及的课程、教学、教材、考试考核制度、教学督导等要素进行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的准则。研究筛选自1999年以来教育部、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及常委会颁发的中央上位政策,政策类型包括“决定”“意见”“通知”“纲要”“计划”和“法律”“行动条例”“工作报告”等,如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课改纲要》)等。各类相关政策总计达80条,其中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期的政策数量为34条、改革创新期的政策为28条、核心素养期的政策为18条。

### 2. 研究方法

根据政策文本的特点,应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计量统计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根据对政策文本中价值观念的历史演进,将评价政策分为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时期、改革创新时期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新时期。通过对政策工具与主题词词频的计

量统计,将三大时期的政策就政策工具、政策主题进行划分。最终构建如图1所示的二维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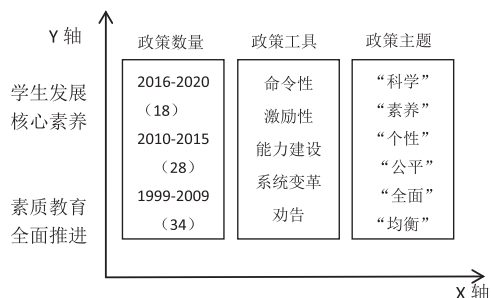


图1 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

### 三、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演进阶段

评价改革作为发展素质教育与体现核心素养教育的切入点,教育评价政策也随素质教育与核心素养政策的发展被赋予不同的历史使命,结合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历史进程的基本脉络,借鉴杨兆山对素质教育政策主题演进的划分,<sup>[5]</sup>研究将评价政策演进分为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期,教育改革创新期和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期三个阶段。

#### 1. 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期(1999-2009年)

该时期以“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评价改革方向,评价政策先后经历了国家意志政策的推行阶段和法律为意志的规范阶段,基础教育评价政策围绕着“素质教育”这一核心主题,向完善和规范化发展,具体表现如下。

该时期评价政策以“素质教育”“法制规范”“全面”为导向。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与全面推进教育的改革发展,1999年的《决定》将实施素质教育提升到国家政策层次,推进素质教育的评价政策也随之展开,如2001年《课改纲要》、2002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等政策从课程、考试与教学评价等方面就素质教育评价机制进行规范。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规定层次,使评价制度与素质教育评价观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价、多元评价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理念也如日方升。该时期的评价方式以考试评价为主,综合评价和水平考试相继发展。1999年《决定》、2002年的《通知》等政策通过改革课程标准和评价考核机制,以突出素质

教育理念。例如“加快改革招生考试和评价制度,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考试应与其他评价方式相结合”“减轻课业负担”等都是对素质教育评价方式的探索。

#### 2. 教育改革创新期(2010-2015年)

该时期的素质教育被提升到“战略”层面,基础教育评价作为教育改革的关键环节,也被赋予了新要求。“创新评价机制”和“以人为本”成为政策的核心主题。具体特征如下。

此阶段在强调“素质教育”的同时,向“科学创新”“立德树人”发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上升为战略主题。科学创新是对促进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发展的更高要求,《纲要》明确要建立科学、多样的评价标准,并提及“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评价理念,该理念先后被纳入“十三五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15修订)》,该时期以品德为导向的科学化、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逐渐确立。

该阶段的评价方式在继承了上一阶段多元评价、个性评价的同时,创新性地引入了第三方评价机构,并对多元评价进行了扩充,对素质教育评价方式进一步科学规范。2010年《纲要》中提出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向管办评分离靠拢。2013年的《教育部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意见》明确,要遵循科学规范的评价原则,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2015年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位,积极采用现代化评价方法和技术。

#### 3.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期(2016年-)

该时期素质教育评价向更高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评价体系的目标迈进,向培养现代化创新素质人才的培育观看齐,其表现如下。

该时期评价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核心素养”和“科学质量”。2016年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从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对相关学段的学生提出

要求;2017年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要形成“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同年“发展素质教育”被写进十九大报告,标志着以“核心素养”为主题的素质教育进入新阶段。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评价方式也逐步采用信息化和现代化手段,探索多方参与的开放式评价,完善评价结果公开机制。现代评价手段和技术日渐纳入评价体系,且成为主要的评价手段。2017年《规划》就综合评价体系、评测结果公开化和可监测化等方面对评价体系做出科学化规范;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要推进教育治理方式变革,加快形成现代化的教育管理与监测体系,推进管理精准化和决策科学化;2020年《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指出要大力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教育评估监测机制、教育督导信息化平台。

#### 四、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依据评价政策主题的纵向划分,研究从各时期的评价政策文本着手对政策工具类型以及政策主题词词频进行计量统计。

##### 1. 政策工具分类

本研究根据黄忠敬的教育政策工具分类法,将基础教育评价政策分为命令性工具、激励性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和劝告工具等。<sup>[6]</sup>其中,命令性工具是一种高度政治性且目标群体必须强制遵从的工具,政策表述包括标准、许可、要求、禁止、监督等;激励性工具是因个人或群体所做出某种行为而给予的奖励或者惩罚,政策表述包括拨付经费、补贴、税收激励等;能力建设是对材料、智力

和人力资源上的长期建设,政策表述包括培训、建设、支持、项目工程等;系统变革工具即个体与机构的权利转变、机制和制度的结构优化,目的是优化权利资源结构,政策表述包括改变政府职能、实行简政放权、放管服等;劝告工具是引导群众按照政策的理念和宗旨行动的书面型认知工具,政策表述包括号召、倡导、应该等委婉语气词。根据相同时期评价政策所表达的内涵差异,研究从三个时间段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整理,具体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在全面推进阶段(1999-2009年),评价政策的颁行多以命令性工具和劝告性工具为主,其次是能力建设和系统变革工具;在改革创新阶段(2010-2015年)依然以命令性工具为主且劝告性工具占比下降,能力建设和系统变革工具占比增加明显;核心素养阶段(2016-2020年)除激励性工具外,其余的政策工具数量上趋于平衡,命令性工具占比下降明显。总体而言,政策工具分布呈以下特点:各阶段的激励性政策工具占比较小,但呈现出缓慢上升趋势;能力建设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占比增加明显,而命令性工具和劝告工具占比呈减少趋势;三个阶段的政策工具月平均值呈显著增长趋势。

以上政策工具数量的变化,或许可以理解为能力建设工具的显著增长,可归因于政策对教师培训、学生发展以及学校建设的不断细化;系统变革工具的增加可归因于评价制度改革更加全面系统、考试评价和招生选拔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三级督导(督政、督教、督学)机制更加配套完善。命令性政策工具的趋于稳定是因为命令性话语是政策工具所必须具备的;而劝告工具因其较委婉的特性,执行政策时的参照价值较小,因此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表1 基础教育评价政策工具分类表

时间	命令性			激励性		能力建设			系统变革		劝告		
	禁止	要求	实行	奖励	鼓励	培养	探索	建设	改革	创新	参与	宣传	应允
全面推进期(1999-2009)	13	46	10	4	1	12	5	17	21	19	2	31	24
总计	69			5		34			40		57		
	205												
改革创新期(2010-2015)	22	30	17	6	2	23	6	23	18	40	6	8	34
总计	69			8		52			58		48		
	235												
核心素养期(2016-2020)	10	26	11	7	4	18	5	22	14	38	7	13	19
总计	47			11		45			52		39		
	194												

## 2. 政策主题词分布

主题词是将文本特性以概念化的语言给予描述。于文本政策而言,主题词是颁行政策所关注重点、发展方向或待解决的难点问题,其出现的频次一般与受关注程度成正比。<sup>[7]</sup>考虑到有的政策围绕特定主题词展开,有的政策则普适性较强,研究利用文档频率与逆文档频率乘积算法(TFIDF特征权重算法)对三大历史阶段评价政策文本进行主题词频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基础教育评价政策主题词词频权重比

素质教育推进期 (1999-2009年)		改革创新期 (2010-2015年)		核心素养期 (2016-2020年)	
素质教育	0.904	教育质量	0.870	教育质量	0.786
义务教育	0.859	义务教育	0.837	义务教育	0.776
制度改革	0.780	素质教育	0.797	素质教育	0.767
评估监测	0.718	制度改革	0.768	创新机制	0.767
教育质量	0.707	创新机制	0.755	科学发展	0.766
减轻负担	0.654	评估监测	0.742	评估监测	0.750
立德树人	0.643	减轻负担	0.720	核心素养	0.721
		立德树人	0.711	制度改革	0.708
				减轻负担	0.692
				立德树人	0.691

由表2可以发现,三大阶段核心主题词有素质教育、义务教育和教育质量。素质教育推进期的核心主题词包括素质教育、义务教育、制度改革。1999年《决定》对我国基础教育评价政策影响深远,它标志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案)》更是将素质教育上升到法律意志层面。改革创新期的核心主题词包括教育质量、义务教育、素质教育。该阶段教育质量的地位显著提高,且科学发展这一主题词权重跃居为第二,反映出高质量发展成为党和政府给予素质教育改革的新使命。核心素养期的核心主题词包括核心素养与评估监测。在延续前阶段重视素质教育评价和教育质量的同时,从新时代教育发展的高度提出核心素养评价与创新教育评估督导机制,例如2016年正式颁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2017年《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提出的新课标评价体系与2020年《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的多元评估监测机制。

## 五、基础教育评价政策文本分析的启示

通过对评价政策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政策工具与政策主题词的量化统计,可以清晰地把握我

国基础教育评价政策的纵向主题演变与横向的发展创新这两大坐标方位。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应从政策演进中审视评价改革中的顽疾与挑战:如何贯彻落实评价政策中“为教而评”?如何在评价政策中确切体现教育公平与质量?如何将评价政策与考试和人才选拔更为紧密联系?如何防止评价政策执行中的权力集中化?

### 1. 贯彻落实“为教而评”的政策理念

“为评而教”强调评价是教育的目的,这就导致整个教育体系桎梏于权威的知识体系与封闭的课程教学,不利于学生创新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养成。“为评而教”将分数作为“甄别”和“淘汰”人才的手段,严重阻碍着教育均衡发展并激化起社会矛盾。“为教而评”将评价作为教学的“服务器”,符合促进学生全面、个性与创新发展的教学本质。我国教育评价政策始终以“为教而评”与“为学而评”为改革目标,但评价改革不应止于政策层次的应然。在执行过程中,政府、学校、教师、家长更应树立素质教育评价观;学生应加强自身的反思性学习评价;教育评价要向第三方的专业评价发展。作为工具性的教育评价要变革固有的“甄别淘汰”,要改进评价方法,激励评价对象成长,加强评价主体专业化,使教育评价为促进学生发展服务。

### 2. 评价政策需突出“差异化”与“个性化”的新内涵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新时代教育评价的具体依据,是对综合素质评价的科学规范,也是评价政策改革的风向标。以政策为导向的评价改革在强调培育学生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方面的同时,要突出“差异化”和“个性化”的新内涵。“差异化”即在评价核心素养时要考虑到学生所处的地域、经济和能力等差异,要求评价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因地制宜是考虑到西部偏远地区的经济落后和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像“主动探究”“项目学习”等需要大量财力和物力的学生活动,很难在这些落后地区开展。因此,评价必须要适切、科学,应该根据地方特色和学校教学的实际条件,制定校本课程评价体系与分级分类的学生评价标准。“个性化”是考虑到学生能力的差异,评价不能简单地将个人、文化、社会的结果相加,而要体现其个性

发展的内在价值,不假思索地“一刀切”是断不可取的。评价政策要向因材施教看齐,针对不同能力类型,如数理逻辑、言语语言、视觉空间、音乐、体育等,既要做到综合评价,也要做好针对评价。科学评价“英才教育”“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是评价个性化的切入点。

### 3. 考试与招生制度应与评价政策紧密契合

我国“不平衡与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放在教育领域则是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两大矛盾,承担着人才选拔与培育的考试与招生制度无疑是解决教育公平与质量问题的切入点,保证招考制度向有利于立德树人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有利于实现教育均衡的方向发展,确保招考制度是为培养人才服务而非为学历与分数服务。具体来讲,在招考制度上,教育评价政策要在考试评价内容与方式、人才选拔及录取机制、严肃招考管理三方面进行大力改革:①改革结果评价,对考试内容与形式进一步改革,<sup>[8]</sup>使评价内容真实地反映学生个性并突出学生的品德发展,评价方式要多元,要将内部与外部、过程与结果、档案与考试结合起来;②选拔标准不以“唯分数”“唯升学”论,政府机构不以“唯升学率”为政绩考核标准,学校不以分数和升学作为教育质量观,招生制度要将学生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考核结合起来,2014年的“3+3”新高考选科模式、2020年的“强基计划”都是对考试制度的创新探索;③推动考试与招生制度立法,以法律为意志的评价政策将有助于严肃考风考纪、落实各教育机构的招考权责、建立依法治考的评价体系。

### 4. 构建多元参与的评价政策执行体系

教育评价政策的科学执行有赖于监督与多元参与。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建立整合多元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和政府督导机制,逐步完善监督政府履职、监管学校教学、监测学生学习的督政、督教、督学三级督导机制,使评估运行“常态化”。自2010年《纲要》起,后续的评价政策都在明确“第三方评价”的“参与化”,其本质是建立“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机制,使评价趋于专业化,促进市场评价服务活力,从而将现代的评价理念和评价技术引入教育评估体系。针对激励性政策不足

的情况,政府部门要在资源配置和资金支持上,积极号召和鼓励市场化评价机制参与,建构评价社会“参与化”体系。同时,鼓励政府机构建立新型的三级监督模式,探索并创新政绩考核机制。

### 参考文献

- [1] 冯虹,朱瑞.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评价政策的回顾及展望[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9(11):28-33.  
Feng Hong, Zhu Rui. Review and Prospect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olicy in China Since 1990s [J].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2019(11): 28-33.
- [2] 褚宏启.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公平:研究问题域与政策工具箱[J].教育研究,2020,41(2):4-16.  
Chu Hongqi.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Equity We Need in the New Era — Consummating the Domain of Research Questions and the Policy Toolbox of Educational Equity[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20, 41 (2):4-16.
- [3] 张向众.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评价改革问题及析因[J].教育科学研究,2010(5):29-32.  
Zhang Xiangzhong. Problem and Cause Analysis of Basic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J].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2010(5):29-32.
- [4] 孙锦涛.专业化教育政策分析探讨[J].教育研究,2017,38(12):22-28.  
Sun Miantao. Exploration on Specialized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7, 38(12): 22-28.
- [5] 杨兆山,时益之.素质教育的政策演变与理论探索[J].教育研究,2018,39(12):18-29.  
Yang Zhaoshan, Shi Yizhi. Policy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Well-Rounded Education[J]. Educational Research, 2018, 39(12):18-29.
- [6] 黄忠敬.教育政策工具的分类与选择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8):47-51.  
Huang Zhongjing. On Education Policy Tools Classification and Choice Strategy[J].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2008 (8):47-51.
- [7] 刘琦岩,张泽玉,张运良,等.从主题词词频变化看我国科技政策演变[J].情报工程,2016,2(4):14-19.  
Liu Qiyang, Zhang Zeyu, Zhang Yunliang, et al. The

Study of Keyword Frequency Change in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olicy in China[J]. Technology Intelligence Engineering, 2016, 2(4):14-19.

[8] 熊丙奇.“四个评价”的意义与前景[J].上海教育评估研

究, 2021, 10(1):21-24.

Xiong Bingqi.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s of “Four Evaluations” [J]. Shanghai Journal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2021, 10(1):21-24.

(上接第72页)

关技能,例如定量类学位论文要求熟练掌握SPSS、STATA等数据处理与分析软件;如采用质性研究,则有必要熟练运用NVIVO、QCA等。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可以通过设置研究方法课、增加科研训练等渠道探索适合论文选题的专门研究方法,强化研究方法应用的规范性与准确性,从而得到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结果。

总而言之,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自然有其复杂性。2020年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体现出我国对研究生教育的高度重视,在这一情势之下,无疑给高教硕士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位论文作为把控高教硕士培养质量的重要环节,值得我们给予更多关注。纵观近五年高教硕士学位论文,成果丰硕,进步显著,却也有欠缺之处,需要重视与改进。当然,一味要求硕士生学术论文的写作尽善尽美难免急功近利,在对高教硕士学位论文的理性价值给予充分尊重的同时,把握时代机遇,循序渐进,切实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方为研究生教育长远发展之道。

#### 参考文献

[1]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M].王承绪,徐辉,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US]Burton Clark. Perspectives on Higher Education — Eight Disciplinary and Comparative Views[M]. Wang Chengxu, Xu Hui, Zheng Jiwei, et al., trans.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8.

[2] 孙怡.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取向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8.

Sun Yi. Research on Topic Selection of Master's Degree Thesi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Recent Ten Years in China[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2018.

[3] 李均,李科浪,蒋铁汉.2001-2008年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分析——以45个高教硕士点的1980篇论文为样本[J].江苏高教,2010(1):25-28.

Li Jun, Li Kelang, Jiang Tiehan. Analysis of Topic Selection of Master's Disserta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from 2001 to 2008: A Sample of 1980 Theses from 45 Master's Programs[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0(1):25-28.

[4] 董云川,李保玉.仿真学术:一流大学内涵式发展的陷阱[J].江苏高教,2018(8):1-8.

Dong Yunchuan, Li Baoyu. Emulational Academic: The Trap of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Top Universities[J].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2018(8):1-8.

[5] 胡建华,陈列,周川,等.高等教育学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Hu Jianhua, Chen Lie, Zhou Chuan, et al. New Theory on Higher Education[M].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5.

[6] 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Pan Maoyuan.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M]. Shanghai: Shanghai Publishing House, 2002.

[7] 别敦荣,彭阳红.近10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以《高等教育研究》刊发论文为样本[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4):65-72.

Bie Dunrong, Peng Yangho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y in China in Recent 10 years and Its Future Trends — Take the Papers Published by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as Sample[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2008, 29(4):65-72.

[8] 叶澜.教育研究方法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Ye Lan. Preliminary Study on Methodolog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M].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1999.